



面向21世纪的中欧关系

薛君度 周荣耀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面向 21 世纪的中欧关系

主编 薛君度 周荣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面向 21 世纪的中欧关系 / 薛君度, 周荣耀主编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2000.10

ISBN 7-5004-2852-9

I . 面 … II . ①薛 … ②周 … III . 中外关系 - 欧洲 - 研究 IV . D82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9815 号

责任编辑 周晓慧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王智厚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ass.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装 订 三河宇新装订厂

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875

字 数 248 千字 印 数 1—1500 册

定 价 2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主编简介

薛君度教授

美国黄兴基金会董事长，英国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顾问，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理事，南京大学及暨南大学校董，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曾执教于香港大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美国马里兰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及哈佛大学。1984年，获秘鲁利马圣马丁德波雷斯大学名誉博士，1999年，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并当选为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2000年4月，与英、俄、德三国著名学者同时当选为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中英文著作甚丰，其中《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被中外学者认为是“数十年来学术界研究辛亥革命最具有影响力的经典之作”，改正过去以孙划线的史学。薛教授虽以此书成名，但其他涉猎亦广，举凡法律、政治、外交、战略、苏俄以及华侨问题，都有兴趣和著述。

美国黄兴基金会经费主要来源出自薛君度、黄德华夫妇，以及后者的大姐黄振华女士（已故），部分是友人指定用途的捐赠，并无任何政府或与政府有关的资助。基金会除鼓励研究黄公克强与辛亥革命外，主要用于支持国内外教育事业，进行学术交流等方面。

周荣耀教授

1946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199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工作，曾任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研究著作有《戴高乐评传》、

《当代法国》（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副主编）、《国际关系史》（第8卷，合著）、《冷战后的东方与西方》（主编）。发表研究国际关系和欧洲问题的论文数十篇。

作者名单

薛君度	教授	美国黄兴基金会董事长
时殷弘	教授	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伍贻康	教授	中国欧洲学会副会长
佟家栋	教授	南开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林 魁	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
田 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硕士研究生
周荣耀	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马胜利	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戴炳然	教授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顾俊礼	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宋新宁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张茂明		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研究生
梁光严	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黄卫平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经济学院院长
艾恒杰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王平贞	讲师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
赵俊杰	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肖元恺	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冯仲平	教授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张志洲	讲师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王 鹤	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姜 毅 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
丛 鹏 副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王 宁 教授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欧洲研究所所长
沈雁南 教授 中国欧洲学会秘书长

目 录

中欧关系的大背景、大环境

20世纪的民族民主运动及其影响	(3)
从经济全球化看区域经济一体化	(29)
欧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43)
多极化预期中的欧洲与现实中的欧洲	(56)

中欧关系：历史与现实

欧洲与中国：用历史的眼光看现实	(71)
两个世界的碰撞——对中欧交往的历史反思	(82)
中国—欧盟关系：历史、现状与前景	(95)
面向21世纪的中欧关系	(104)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及其对中欧关系的影响	(115)
冷战后影响中欧关系发展的意识形态因素浅析	(135)
中欧经济关系：面向21世纪的回顾与展望	(145)
跨世纪的中欧科技关系	(153)
千禧之年看中欧关系	(167)

冷战后中欧关系的范例

中英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183)
九七之后中英关系的重新定位与发展	(196)
中英经贸关系	(213)
世纪之交的中俄关系	(226)

跨世纪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255)

中国在欧洲 欧洲在中国

形象的演变:中国文化在欧洲 (273)

欧洲研究在中国 (286)

后 记 (305)

中欧关系的大背景、大环境

20世纪的民族民主运动及其影响

绪 言

作为唯一产生了先进的现代工商业文明的地区,欧洲在19世纪末以前是世界最有活力的权势中心。^①欧洲列强凭借这一优势向全世界扩张,在19—20世纪之交达到了顶峰。欧洲的现代技术和工商业侵蚀、瓦解和重新塑造了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生存方式,欧洲基于其先进技术、社会政治组织和扩张主义精神优势^②的那种军事力量击败了非西方民族的几乎所有武装抵抗,欧洲文化则严重动摇甚或损害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亿万人对本土文化的自信,影响或左右了他们(尤其是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甚至思维方式。然而,这种看似牢不可破的欧洲支配地位实则好景不长,因为欧洲的扩张在把世界结合为一个整体的同时,也激活了世界非西方民族在改变了的内外环境中争取独立自强的潜在力量。这就开始了它始料未及并且最终无法控制的一个历史进程——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的觉醒和新生。1900年,美国著名黑人运动领袖和作家威廉·杜波依斯断定,20世纪的首要问题将是“肤色线”问题,即世界有色人种同白人的关系问题。几年后,未来国际关系理论

① William H. McNeill, *The Rise of the West* (Chicago, 1963), Part III.

② 关于这种精神优势在欧洲扩张史上的巨大重要性,见 Michael Howard, “The Military Factor in European Expansion,” in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eds.,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1984), pp. 33—42.

学科的创始人之一阿尔弗雷德·齐曼也预言说，在他那一代人的生存期间里很可能会发生最重大的历史事态——有色人种赢得对白种人的胜利。^①的确如此，20世纪开始时，占全世界陆地面积和人口数量大部分的广大不发达地区，差不多全都是欧洲列强（加上刚崛起的美国和日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而到70年代后期开始时，各大殖民帝国俱已瓦解，半殖民统治亦然。“统治—从属关系已被认为是不合法的国际关系模式，外国统治已成为被诅咒之物，经济剥削遭到谴责和抨击，领土补偿已被当作外交上荒唐可笑的……国际行为的现行规范要求非殖民化，其强调程度恰如早先的殖民化规定一样。”^②主要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二三十年内的这一伟大变化，就范围、幅度和速度而言，都可被认为是人类政治变更史上首屈一指的。它是非西方民族“对西方造反”的结果，而贯穿于其中的是政治独立、主权平等、种族平等和文化解放这四大主题。^③然而，与“造反”密切相关的，是非西方对西方文明，特别是西方技术、观念和体制的主动适应和有选择的吸收，即向西方学习。非西方国家的先进分子既对西方的奴役和统治“造反”，也向本国的传统势力挑战，他们向往的并非是返回到西方人到来前的社会，而是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发展。“……基马尔、尼赫鲁、毛泽东、苏加诺和我们时代的其他许多人所遵循的道路，是借用欧洲北美先进

① Gerrit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1984), p. 50.

② Donald J. Puchala and Raymond F. Hopkins, “International Regimes: Lessons from Inductive Analysis,” in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N. Y., 1983), p. 73.

③ 分别在历史学和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占重要地位的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和海德利·布尔都用“对西方造反”一语来概括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非西方世界的根本历史发展。见 Geoffrey Barraclough,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1967), Chapter 6; Bull and Watson eds.,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Chapter 14.

国家的经验的道路，即使是有选择的，且以改变世界现行权势分布为目的的。”^①他们所借鉴并同本国国情结为一体的经验，其大部分可以最简洁地概括为如何创建现代民族国家，而他们对世界历史的伟大贡献之一，就在于决定性地完成了500年来世界政治最基本的趋势^②——现代民族国家成为人类普遍的政治组织形式。在现代世界，先进的经济技术方式、社会政治方式和思想方式，都必然广泛扩散，决非某一国家和地区所能长久独占的。20世纪，西方的先进成果一直在以加速度扩散，在此过程中西方逐步失去其全面的压倒性优势，非西方民族则经学习和“造反”摆脱了西方统治。

一 亚非现代民族主义的萌发和兴起

概而言之，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的崛起及其导致“造反”成功的过程，经历了巴勒克拉夫总结的三个典型阶段，^③而较早经历这些阶段的是亚洲的现代民族主义。首先有被称为“原始民族主义”的准备阶段。在此阶段中，西方扩张者对其控制下的非西方传统社会的侵蚀和破坏，连同他们或其代理人的无情剥夺、肆意侮辱和残酷压迫，激起了以仇恨西方人和眷恋旧传统为主要特征的反抗运动。此类反抗固然同已逝的往昔有着千丝万缕的感情联系，但其中不少已经出现了对西方影响作积极回应的萌芽。^④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失败引起了对传统体制和文化之现今价值的深刻怀疑，

① Healey Bull, *Just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aterloo, Ontario, 1984), pp. 22—23.

② George Modelska,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Seattle, 1987), p. 150.

③ Barraclough,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 pp. 177—178.

④ Ibid., p. 177. 参见 K. M. Panikkar, *Asia and Western Domination* (London, 1969), p. 237.

这同其他因素一起,促成了下一个阶段,即现代民族主义的真正出现。在其中,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一般由开明的精英领导担任,其社会基础几乎全由城市的部分中小有产者和知识分子构成,而其目标大多是以争取部分民族权利和若干政治、文化进步为出发点,来改良西方或其代理人的统治,而非推翻之。第三个阶段是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的蓬勃兴盛和大发展,它的特征主要在于将城乡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进一个旨在最终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革新(或改良)的运动中去。它与第一阶段的主要区别,在于积极地顺应了世界潮流而非徒然眷恋过去,与第二阶段的最大不同,则在于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强大的政治力量,从而具备了“造反”成功的根本保障。

从时间和重要性来看,亚洲现代民族主义兴起的代表是中国、印度和土耳其。在中国,甲午战败后,列强的瓜分狂潮,激发了两大“原始民族主义”运动——戊戌变法与义和团。戊戌变法的领导者们希望走明治维新的道路,而且(特别是康有为一系)力图维持儒家体系的根本价值观念,办法是按照现代条件来解释儒家经典。^①义和团则是下层大众的反帝反洋运动,其组织、宣传和作战方式完全出于民间旧传统,被清廷顽固守旧派所利用。1905年,上海总商会为抗议美国排华暴行和排华法令,发起大规模地抵制美货运动,席卷中国十几个省和数百个城镇,持续时间长达8个月之久。^② 它实际上可被认作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开端。短短几年后,严重侵害中国主权和华商利益的湖广铁路借款又激起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这场数省绅商民众共同反对清政府“夺路劫款,转送外人”的斗争,连同孙中山及其同盟会的革命活动以及为反对

^①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94、308—312页;Barraclough,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 p.163.

^②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5—19页。

“二十一条”而掀起的大规模抵制日货运动,^①表明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已广泛崛起,而1919年的五四运动更标志着它已步入上述第三阶段。在印度,自从“原始民族主义”的大爆发——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之后,民族主义几乎始终与国大党联系在一起。这个1885年成立的政治组织起初旨在使一盘散沙似的印度人具有统一的印度民族概念,并且倡导通过某些改良来为印度上层受过现代教育的人士取得一些参政机会。^②在其头20年里,国大党差不多无异于一个上等阶级清谈馆,而果帕尔·克里希那·郭克雷是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党的领导人。20世纪开始后不多几年,激进派崛起于国大党内,其领袖帕尔·根加德尔·提拉克主张必要时以暴力推翻英国统治。不过,他以复旧的姿态大力褒扬据称纯洁的印度教传统,反对变革种姓制度和落后风俗,因而他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向后看的、半宗教的民族主义。^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印度民族运动在既通晓西方文化也深知印度国情的大政治家和思想家——圣雄甘地领导下,开始进入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的第三阶段。在土耳其,较早的现代民族主义意识产生于19世纪中叶后期,它们的基本特征是反对政教合一和陈腐落后的专制帝国体制,主张以土耳其现代化来改善愈益严重的半殖民地状态中本民族的独立生存机会和发展机会。^④被称为“青年土耳其党人”的要求改革者鼓动和支持帝国宰相米德哈特于1876年制宪,规定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但很快因旧势力反扑而失败。下一代青年土耳其党人以作家兼社会学家齐亚·戈卡尔普为思想领袖,主张建立能使现代

^① 关于保路运动和反对“二十一条”的运动,分别见刘大群“谈湖广铁路的恶债性质”,载于丁名楠等主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一辑,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234—235页;Poerre Renouvin, *War and Aftermath, 1914—1929* (New York, 1968), p. 50.

^② Hans Kohn, *Nationalism: Its Meaning and History* (Malabar, Florida, 1982), p. 85.

^③ Barracough,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 p. 179; Kohn, *Nationalism*, p. 86.

^④ Ibid., p. 62.

知识精英掌权的政治体制。1908年，他们发动起义，逼迫苏丹恢复宪法，重开国会，但国家政治的其他方面基本未得到改革。到土耳其现代民族主义的下一个阶段，即“基马尔革命”时期，斗争的主要矛头将直指西方帝国主义。另外，同样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印度尼西亚、越南和菲律宾等地也开始有了现代民族主义运动或其萌芽。以印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几年出现的最初的一些民族主义团体为例。这些团体都以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发起者和骨干力量，都希望印尼诸岛人民结合为统一的现代民族，而且都要求改革甚或最终取消荷兰统治。^①

亚洲现代民族主义的萌发和兴起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根本性的，即伴随西方入侵而来的新社会因素和当地人民固有的民族自豪和自尊感，另一方面则是情势性的，包括世界政治形势的激励及其所提供的机会、俄国两次革命（1905年和1917年）的巨大影响以及威尔逊主义自决原则的影响。在入侵和统治的过程中，西方人损伤或瓦解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构造，同时促成和造就了亚洲当地新的、先进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接受过西方现代教育的部分知识精英。西方教育和其他媒介传播的西方现代政治观念，对亚洲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形成及其纲领塑造起了尤为突出的作用。在印度，在英国殖民政府竭力压制自由的同时，英国人创办的院校却向当地青年传播自由思想；在越南，法国人虽然没有栽下自由之树，但却栽下了知识之树，使武元甲这样的学生了解到法国大革命及其大众动员的经验。国家平等和种族平等，民族解放和社会变革——这些观念都来自西方，

^① Robert J. McMahon, *Colonialism and Cold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Struggle for Indonesian Independence, 1945—1949* (Ithaca, N. Y., 1981), pp. 29—30. 关于越南和菲律宾的早期现代民族主义，分别见 John T. McAlister, Jr., *Vietnam: The Origin of Revolution* (Garden City, N. Y., 1971), Chapter 5; H. W. Brands, *Bound to Empir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hilippines* (New York, 1992), Chapters 3—5.